

影响汉维语修辞翻译的因素

阿尔帕提古丽/ AERPATIGULI*

[摘要]

汉维两个民族之间的地理环境、生产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两种语言中存在大量修辞，展现了汉维两个民族的独特文化的文化特征。在汉维互译中，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译文时常不理想。为了更好地为语言翻译服务，我们探讨影响汉维语言修辞翻译的因素，力求使原文和译文保持一致，形神兼备。

[关键词] 影响；维汉修辞；翻译因素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 Rhetoric Translation

Abstrac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culture of productions, religious believes historical culture, people's way of thinking and values so on so forth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Uyghur peopl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Many rhetoric exist in both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s, this verify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Uyghur nationals.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s have affected by these factors and often have resulted unsatisfactory.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language translation, we try to discus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rhetoric and try to keep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translation consistent and alive.

Keywords: influence, Uyghur and Chinese Rhetoric, factor of the translation

修辞的定义和功能

修辞 (rhetoric)，源于希腊文rhetorica，本意为演讲的技艺。rhetoric 也是“修辞学”之意。西方古典的“rhetoric”和古代汉语中的修辞都强调“说服”作用，是以论辩演说来达到说服的目的，也就是说，说服的“目的”必须依赖词格当为“技巧”或“手法”来表达。^[1]由此可见，修辞和演讲甚至可以说是语言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修辞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只存在于语言之中。修辞是以词汇、语法为基础的高一级的语言现象。

修辞有许多定义，这些定义虽然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修辞的本质特点，但国内外学者的定义中还是存在不同的观点。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哲学家和科

*西北民族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School of Uyghu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P.R. China, 730030, Email : 41997010@qq.com. Mobile : 13519634205. Geliş T. / Received Date: 11/08/2017 Kabul T. / Accepted Date: 14/09/2017

¹亚里斯多德.《修辞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页/Aristotel, 'Şiusişüe' [Belâgat], Şanghay: Şanghay Asır Yayın Grubu, 2006, s. 1.

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定义是“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2]现在修辞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就认为“修辞学力图(也有充分理由)成为一门纯客观的科学。它记录事实并将他们分类”西方现代修辞学的创始者是索绪尔的学生巴利。修辞学是一门语言科学,是以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规律为研究目的的学问。整个语言学的社会形象都离不开修辞学。

修辞,狭义上就指语文字修辞;广义上包括文章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全过程,同时也包含语文字修辞。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借代、拟人、双关、对偶、夸张、仿似等等。广义的修辞中可以包括风格和语体,狭义的修辞不包括风格和语体。修辞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修辞学就是要分析有各种修辞手法构成的美或不美甚至丑的语言形式和特点,揭示它们内部固有的规律,对人们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起到作用,让语言更为优美。

汉维语修辞研究状况

我国汉维语对比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涉及到汉维对比修辞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才有了一些增长。汉维语修辞对比研究作为汉维对比语言学的重要一部分,还是显得落后。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发表了近三十篇论文研究汉维对比修辞。如阿孜古丽·吐尔逊在《汉语的双声叠韵与维吾尔语的叠音押韵》一文中,就汉、维两种语言里常见的双声词和叠韵词以及叠音押韵等修辞格作了初步探讨。刘向晖在《维吾尔语拟声词与修辞》中,从分类语言学的角度描写了维吾尔语拟声词,比较详尽地讨论了复合式拟声词,并对维吾尔语拟声词的修辞功能进行了分析。较早涉及汉维语词语修辞对比方面的文章大致有海尤尔·阿布都卡地尔的《论汉维语修辞手段的对比研究》。

在汉维修辞研究方面比较有名的是教授刘珉先生,他在1995年著的《汉维语修辞格概要》,专著中从搜集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对比研究。刘珉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开辟汉维语对比修辞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汉维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研究、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珉从变异特征出发,把修辞格分为音变、义变和形变辞格,音变辞格包括双声、叠韵、描绘、双关,该书主要从辞格的角度来对比。而对某一文本的语音修辞作了定量分析的要属阿尔斯兰·阿布都拉的修辞专著《福乐智慧》的修辞研究,音乐美的角度论述了《福乐智慧》中语言的音乐美、形成语言音乐美的手段。庄淑萍的《试论维吾尔语中的比喻及其民族文化特征》一文,从比喻的构成与内容、喻体的色彩两个角度深入探讨了维吾尔语比喻的文化特征。

²亚里斯多德.《修辞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9页/a.g.e., s. 19.

影响汉维语修辞翻译的因素

1. 思维、认知差异

萨巫尔在其《语言论》中明确指出“语言是通向思维的惟一途径。”这充分说明了思维和语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没有语言就没有了思维和意识，反之亦然。统一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必然会导致思维方式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思维方式是人们在有意识的总结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时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模式。一个民族的总体思维方式依赖于该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并受经历的历史时期、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程度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的来源与该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拥有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和价值观都是不同的。在修辞的使用过程中，所用的表达方式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汉民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偏重人文，凡事求和，关注大同思想。长久以来过着游牧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则更偏重大自然，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思维影响也不少；维吾尔族的思维方式往往离不开宗教制度的影响。

例如：toxu yüräk胆小如鼠，维吾尔族眼中，toxu 是胆小、懦弱的象征，汉民族人则认为这样的角色只能是“老鼠”所以才产生了这不同的修辞方式。汉维两个民族所产生的相同联想会表现在不同的事物上。如：汉语中的“家丑不可外扬”在维吾尔语以“qol sunsa yän içidä,baş yerilsa bök içidä”来表示。汉语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维吾尔语中“börä yoq jaŋgaldä, maymun şax bolar”。由此可见，两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存在有着不同的认知思维。

关于“死”几乎是各民族都比较忌讳的字眼，所以对死的禁忌是各个民族都存在的，但是用修辞却各不相同。如：在维语中köz yumdi,alāmdin ötti, tügäp kätti等词语来表示“死”，而汉语则用“告别人世、驾鹤西游、魂归西天”等词语表示。汉民族习惯于使用具体、形象的词语来表达虚的、抽象的概念。而维吾尔族则常使用涵义概括、指称笼统的抽象词语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例如：

1.1. yaxşi söz taşni yarar,yaman söz başni. 良言能穿石，恶语会伤人

除此之外，两个民族对事物的认知截然不同，例如：维吾尔语中的“qapaq baş”（葫芦头）象征脑子不好使、反应迟钝的笨蛋。而汉语中对“葫芦”只是一种植物。

由于汉维两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各有独特的审美观。民族心理特征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直接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思维。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个事物两民族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全释，从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观，最终在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内涵的语言层面上表现出来。

例如：维吾尔族意识中“ğerip-sänäm”“läyli-mäjnun”“pärxat şerin”等人物是爱情、情侣的象征，而汉语中的“祝英台和梁山伯”、“鸳鸯”“牛郎织女”才是真爱的象征。维吾尔语中以“hör-päri”来借代非常美的人物，而汉语用“西施”来表示美人。维吾尔族认为“情人”犹如“kakkuk”，“pärwanä”，这在维吾尔文学中常见。例如：

1.2. sähärdä oyğitip dilni xumarliq sayridiñ kakkuk, baharni sän zimistan-din küyüñdä ayridiñ kakkuk. 《ğäzäl wä muxämmäslärdin》

2. 地理环境与生产文化差异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文化又产生了特定的语言文化及相应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由于地形、气候、物质生活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地域文化差异。

汉民族的先民生活的地区盛产竹子，与竹子发生了密切关系。在创造成语时，竹子便自然而然引起了汉民族的丰富联想，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青梅竹马”“雨后春笋”“滥竽充数”等与竹文化有关的词语^[3]。例如：

2.1. 故乡吴江多好山，笋舆蔑舫相穷年。（范成大《题金牛洞》）

例子 1 中的“笋”代“竹子”。除此之外，“黄河”“长江”也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因此，在语言表达上他们所联想的自然与河的事物有关。植物、动物、自然环境等方面也能看出两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例如：

2.2.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江上咏》）

2.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

2.4.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杜甫《夔州歌十绝句》）

例子 2, 3, 4 以夸张的方式折射出汉民族的地域文化。而新疆也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地域文化，所以维吾尔语的修辞也带有较强的区域性。维吾尔语中常见沙漠、戈壁、雄鹰、苍狼、骆驼、牛羊、骏马、巴达木、红柳、胡杨等词语。这些词语生动地体现了新疆的地域文化。“töginin quyriqi yärgätägmäs”，“at aylıxanğa yol sarıxanğa”，“samanda säkkiz”，“qum çiçäkligändä”，“mozayniñ yügirişi samanliqçıça”等词语带有浓郁新疆地域特征。例如：

2.5. yıraq bolsa kişnişär,yeqqin bolsa tipişär.

2.6. yałguz atniñ çenji çıqmas,çenji çıqsimu deni çıqmas.

维吾尔族长期居住在西北戈壁沙漠，在与恶劣的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崇尚阳刚之美的审美心理。因此，往往选取牧民们熟悉的动物来表现男子的刚劲勇猛的地域文化色彩。例如：

2.7. xoraz soqušta bolsimu çaqqanmiş,tirnaq laçınğa qaçan jän açqan.

Müşük şir bolidu çaşqan tutušta,lekin u yowasniñ aldida çaşqan. (säidi 《gülistan》)

^[3]李纯.《维吾尔语比喻与地域文化探究》[J]昌吉学院学.2011 年第6 期/Li Çun, 'Veyvueryu Biyü yu Diyü Venhua Tanciu' [Uygurca Metaforlar ve Yerel kültür Araştırmaları], Çangçı Enstitüsü Dergisi, sayı 6, 2011.

2.8. soquşqanda yolvas yüräk keräk, tutuşqanda yilpiz keräk . 《Qutatğu bilik》

“tağni talqan, çölni bostan qılmaq”, “başta yağaq çaqmaq”, “tağdin sorsa bağdin jawap barmäk”, “üjmä könjül”, “pul bolsa jaŋgaldä şorpa”, “anarni çölgä tik, änjürni kölgä .”等折射出维吾尔族浓郁的沙漠、绿洲的地域文化特色雄鹰、暴风、戈壁、沙、狼、商队、骆驼、石子等词语折射出的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戈壁沙漠文化信息。

骆驼是沙漠中的主要运输工具，舟是海洋中的交通工具，从这一角度看，它们之间具有相似性。骆驼是在沙漠地区所独有的动物。它是一种吃苦耐劳、忍饥耐渴、长途跋涉的动物，并且享有“沙漠之舟”之美誉。骆驼在维吾尔语里是带一点神圣色彩的称呼，它被维吾尔族当作象征物使用。例如：“Boti-laq”, “töginin quyruqi yärgä yätkändä”, “tögiğä minip tögä izdäs”。

作为一个古老的农牧民族的维吾尔族生活的部分地区,如山区高原的生态条件,仅适合于游牧和狩猎。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像古代商业民族为了经商而飘流海洋一样,使维吾尔族为了生存而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经常逐水草迁徙,过游牧生活^[4]。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原因,他们由起初的牧业、狩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生活转入农牧并重发展的经济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游牧生活传统的惯性,有关动物的修辞方式在维吾尔语中比较多。例如:“Oquri igiz”眼光高“at aylinip oqurini tapidu”落叶归根,“qoy koz”大眼睛“qozam”宝贝“bir päläktä miñ xämäk”各种各样,“aydinğa qetiğ içmigän”不是一路人“oruq kaliniñ poqi yoğan”等等,生活在草原或熟悉草原生活的人,常用雄鹰、苍狼、牧草、牛羊、骏马、等词语来作修辞。

2.9. Ala inäknin balsi çala quyruq 有其母必有其女

2.10. Attin çüşsimu özängidin çüşmädiran 死要面子活受罪

2.11. Män aldiraymän mañğili işğim aldiraydu yatqili 皇上不急太监急

古代的维吾尔族先民从狩猎经济发展到游牧经济以后,就把饲养好牲畜当成头等大事,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牲畜。他们在适应和改造大自然同时,保持了原有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上原有的畜牧业与农业都有密切的关系。在维吾尔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从中体现出独特的维吾尔文化。例如:“üjmä könjül”花心“saman qosak”没有知识。

2.12. kätmän çapqanda dost iduq, yañaq çaqanda ayrilduq.

有苦的时候是朋友,有钱的时候互不认识。

2.13. osma ketidu, qaş qalidu; su ketidu, taş qalidu.

(水流了石头在, 乌斯玛褪了眉毛在, 比喻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不能久留)

[4]阿爾斯蘭·阿不都拉. 《“福乐智慧”中的比喻及其民族特色》[J]《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4月/Arslan Abdullah, 'Fulecihuy congde Biyu çiçi Minzu Tese' [Kuatadgu Bilig'teki Metaforlar ve Onun Milli Özelliikleri], Miletler Edebiyatı Araştırma Dergisi, sayı: 4, 2002.

生活在农村或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人所熟悉农事、牲畜、禾稼、土地、粪肥,便常以此来作比。生活在海边的人,平常与海洋打交道,自然是以海洋、海产,渔船等相关。长久以来,汉民族历史上地处内陆沿海地区,农业生产一直是汉民族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整个社会到现在为止以农业为基础,从古到今受农耕文化影响很深,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土地,属于农耕文明。在农业社会中,庄稼是主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反映在语言上,汉语中大量引用农作物的形态特征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事物和现象作修辞比比皆是。例如:

2.14.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李坤《悯农》)

2.15. 你只有谷城县弹丸之地。吃糖小, 难养大鱼。(姚雪根《李自成》)

2.16. 和露摘黄花, 带双分紫蟹, 煮酒烧红叶。(《双调夜行船·秋思》)

此外, 汉民族的祖先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从事织编了。在语言中, 汉民族也乐于选用桑、蚕、丝等作为代替和事物。因为历史悠久的丝绸生产, 培养了汉民族人民对桑、蚕、丝、绸的特殊感情。

1. 宗教信仰差异

宗教信仰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贯穿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最终在语言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宗教文化必定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 宗教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 宗教依赖于文化, 有其具体的文化前提。汉民族信奉佛教和道教, 所以大部分信奉佛和道长。心目中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三大宗教, 它们对中国人, 尤其是对汉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维吾尔族的信仰是伊斯兰教, 他们经常诵读的是《古兰经》, 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创造宇宙万物, 主宰一切的唯一真神, 因而在宗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翻译中稍有不慎, 便会出现失当。汉语中许多词语都含有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例如: “一尘不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借花献佛”、“点石成金” 等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维吾尔语中的“ xudaniñ dārgahiğa kätmək”, “molamniñ digini qil, qilğini qilma”, “xuda qoşqan bir jüplär”等无不渗透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的宗教色彩。例如:

1.1. xuptāndin qiçip tarawıǵa tutuluptu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汉语的九霄外、“三灾难”等词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三灾难是佛教用语, 翻译成维吾尔语时大多借维吾尔语词。例如

1. 2. 宝玉不觉心中大畅, 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 《红楼梦》

Baoyünin aǵriqı yättä qāwāt asmanin nersığa uçup kätti.

1. 3. 从小儿三灾八难, 花的银子照样打出你这个银人儿来了。《红楼梦》

Kiçikiñdin tartip saña miñ bir japada şunçilik köp kömüş särip qıldıuqki, buni quyduǵan bolsaq sändäk bir kömüş adām pütüp çiqqan bolati.

有些修辞词汇虽然都有对应的词汇，但由于它们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不同，不同的语言中代表不同的事物。在翻译时需特别注意比如：自古以来“龙”在汉民族文化中享有崇高地位，是“神圣，高贵，吉祥，民族精神之象征”。而维吾尔语中的“龙”则是传说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在民间故事中，它被描绘成一个怪兽，毁坏人间美景的怪物，成了“魔鬼”“暴君”的代名词。

宗教角度纵观维吾尔文化传统，维吾尔族除了伊斯兰教以外曾信奉萨满教、摩尼教、拜火教、佛教和苍天崇拜。萨满文化传统不同程度地保留到今天。维吾尔文学和谚语中大量存在着有关日、月、星的修辞方法。例如：

1.4. Asminimda ayimsän, boynumda tumarimsän,
keçäliri nur çaçqan, yoruq çiraqım sän. 《uyrur xäliq qoşaqliri》

2. 历史文化差异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自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在语言中充分的表现出来。特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遗产沉淀形成历史文化。由于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历史发展不同，所以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沉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典故中有一部分可以在词典中查到，但有一部分无法查找。随着社会和语言的不断发展，往往会产生新的典故，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翻译问题，在翻译修辞的过程中很常见。语言的各个层次都能体现出历史典故，它是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历史典故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髓，它最能体现出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因为它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历史典故用简单的符号传达了复杂的信息，具有多重意义。“铁面包公”、“龙城飞将”、“曹操”、“孔夫子搬家”等都是汉文化中的历史人物。例如：

2.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Köpniñ äqli köp.

2.2. 司冯昭之心，路人皆知。《三国志》 Qara niyiti oçuq aşkarä.

诸葛亮、司冯昭都是汉文化中的历史人物，带有明显的历史文化色彩。不懂汉历史文化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名而已，翻译时不能体现出原文的文化信息。每一个历史典故在成语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助纣为虐”、“井底之蛙”、“剖腹藏珠”等来源于汉民族的寓言故事或神话传说，反映了一定的汉民族的历史文化。

维吾尔语中的“apaq ğoja”、“amanisaxan”、“jalat xenim”、“aq tağliq qara tağliq”、“täypinäm”、“siyit noçi”、“äpändim”等等源于维吾尔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例如：

2.3. äpändimdäk iş qılmay ,awal wäzipäñni tügätkin.

2.4. ozüñni çin tömür batur çağlap qapsändä.

2.5. läyliñi körüş üçin mäjnuniñ közi boluşı keräk.

例子3中的“äpändim”是以幽默的方式讽刺腐败的地主，帮助老百姓的历史人物，在这里表示不要做可笑的事。例子4中的“çin tömür batur”表示有勇气的大力士。例子5中的“läyli”和“mäjnun”是一对情人。这些人物都是来源于维吾尔神话故事的比喻反映了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文化。

因此，在翻译时应搞清楚典故的明确含义，针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适当的处理方法。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汉维互译过程中，双方语言是紧密联系的，它们不能孤立存在。这是因为翻译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相对自由的。翻译往往要受一定的历史文化的制约和限制，原因根源是汉维历史文化间存在的差异。

3. 饮食文化差异

饮食也是民族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民族性的部分。在饮食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饮食文化的积淀引伸出许多文化色彩浓郁的词语。由此可见，汉维两个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和历史，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意象，这也明显的反映出两个民族饮食文化的差异。

馕在维吾尔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食，自然也具有丰富多彩的馕文化。千年不变的生态环境使馕文化与古代维吾尔族生息繁衍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种共性关系。由于浓厚深重的文化积淀，与之有关的词语在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例如：“nan qepi”、“nan ursun”、“neni pütün”、“siñän neniñni yä”等等。

3.1. Buğday neniñ bolmisa ,buğday sözün yoqmu.

3.2. Ikki nan tapsa birdä dap çeliptu

从例子 1 的“buğday”可以看出，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以面为主食，汉民族通常以米为主食。在这里表示“好话，礼貌”。例子 2 表示“肚子饱了就开始忘记过去的贫困”。除此之外，维吾尔语中还有由饮食文化的积淀而引申出了“Hemir turuçliq qilmaq, eçitquliq kilmaq. eçişqan yärgä tuz säpmäk”、“may tartmaq”，“yiliktäk yaqti”等等词语。例如：

3.3. kawapmu köymäydiğan, ziqmu köymäydiğan.

3.4. Ikki qoşqarniñ beşi bir qazanğa patmas.

例子 3 的“kawap”也是维吾尔族人最爱吃的食物之一，在这里表示“好办法”，例子 4 表示“一山不容二虎”。

汉民族的酒文化比任何一个民族丰富多彩，几千年以来对“酒”培养了特殊的感情。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酒，因此，在语言中，汉民族也乐于选用“酒”来表达思想。例如：

3. 5.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3. 6. 每个人都向王又天敬酒，使他简直应接不暇。幸而他是海量，没有醉倒。

(姚雪根《李自成》)

例子 5 中的“杜康”是人名，伊士珍《娘嬛记》中卷说：“杜康造酒，因称酒为杜康”。例子 6 中的“海量”是对酒量的夸张。

汉语中也同样饮食文化的积淀而引申出了文化色彩浓郁的词语。“钟鸣鼎食”、“膏粱锦绣”、“膏粱文绣”、“锦衣玉食”、“吃官司”、“炒鱿鱼”等等。例如：

3.7. 谁知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家，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曹雪芹《红楼梦》)

3.8. 东家门里有酒肉，佛户家中无米面。(贺敬之《白毛女》)

3.9. 打江山不是容易的，并不是别人做好一碗红烧肉放在桌子上，等待你坐下来狼吞虎咽。(姚雪根《李自成》)

例子 8 中的“钟鸣鼎食”表示幸福生活。例子 9 中可以看出汉族人日常生活的饭菜类型

结语

修辞翻译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在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并不可低，非一两篇文章所能涵盖、论及。从以上列举的修辞现象可以看出，不同语言本身特色造成各种修辞的翻译问题。修辞手段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非常丰富。对维汉修辞进行互译时，要灵活应用翻译方法，使原文和译文保持一致。修辞的翻译相当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语言还涉及到文化、认知等诸方面。文学及文学翻译本身存在特殊性，而且修辞在文学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否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思想、精神和风格联系到是否正确体现出原文的修辞格。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实践时，必须将修辞的翻译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察，并采取恰当的翻译手段来对修辞翻译进行弥补，实现译文与原文真正意义上的动态对等，再现原文的色彩。

参考文献

-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张敬仪.《汉维-维汉翻译理论与技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刘珉.《汉维修辞格概要》[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修辞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
 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商务印书馆.2005年.
 陈汝东.《修辞学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阿爾斯蘭·阿布都拉.《“福樂智慧”的修辭學研究》[M].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年.

Kaynakça

- Çen Rudong, '*Dangday Hanyu Şiusişüe*' [*Çağdaş Çince Belâgatı*], Pekin: Pekin Üniversitesi Yayinevi, 2014.
- Cang Cingyi, '*Hanvey, Veyhan Fanyı Lilün Ci Ciçiao*', [*Çince-Uygurca, Uygurca-Çince Çeviri Teorisi ve Becerileri*], Pekin: Milletler Neşriyatı, 2004.
- Liu Min, '*Hanvey Şiusige Gayyao*' [*Çince-Uygurca belâgatı özeti*], Ürümçi: Şinciang Halk Neşriyatı, 1995.
- Vang Deçun ve Çen Çen '*Şianday Şiusişüe*' [*Modern Belâgat*], Nançang: Ciangşi Eğitim Neşriyatı, 1989.
- Çen Vangdao, '*Şiusişüe Fafan*' [*Çin Belâgatının Anahatları*], Şanghay: Şanghay Eğitim Neşriyatı, 1997.
- Zong Yanhu ve Çen Guangley, '*Congguo Şiusişüe*' [*Çin Belâgatı*] Çangçun: Cilin Eğitim Neşriyatı, 2007.
- Yu Guangyuan, '*Hanyu Şiusige Facanşi*' [*Çince Belâgatın Gelişim Tarihçesi*] Çangçun: Cilin Eğitim Neşriyatı, 2003.
- Vang Şicie '*Hanyu Şiusişüe*' [*Çince Belâgat*], Pekin: Şangvu Yayinevi, 2005.
- Çen Rudong, '*Şiusişüe Lünvenci*' [*Belâgat Makaleler Macmuası*], Pekin: Pekin Üniversitesi Yayinevi, 2005.
- Sao Şüeçin ve Gao E, '*Hongloumeng*' [*Kırmızı Konakların Rüyası*], Pekin: Pekin Halk Neşriyatı, 1985.
- Sun Cingli, '*Fanyı Lilün yu Şician Tansuo*', [*Çeviri Teorisi ve Uygulaması Araştırmaları*].Nancing: Yilin Neşriyatı, 1999.
- Arslan Abdullah, '*Fulecihuyde Şiusişüe Yanciu*', [*Kutadgubilig Belâgatı Araştırmaları*].Ürümçi: Şinciang Üniversitesi Neşriyatı, 2001.
- Li Çun, '*Veyvueryu Biyü yu Diyü Venhua Tanciu*' [*Uygurca Metaforlar ve Yerel kültür Araştırmaları*], *Çangcı Enistitüsü Dergisi*, sayı 6, 2011.
- Aristotel, '*Şiusişüe*' [*Belâgat*], Şanghay: Şanghay Asır Yayın Grubu, 2006.
- Arslan Abdullah, '*Fulecihuy congde Biyü çiçi Minzu Tese*' [*Kuatadgu Bilig'teki Metaforlar ve Onun Milli Özellikleri*],Milletler Edebiyatı Araştırma Dergisi, sayı: 4, 2002.